

學生運動與社會改革

王雅各

社會運動是一群人有意識、有目的的一種組織行動，其目的在於改變現有的秩序或求資源的重新分配（註一）。社會運動通常是造成社會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因，也因此社會運動，成了社會學中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在繁多的社運種類中，學生運動扮演著一個樞紐性的角色：不僅僅因為學生提供了許多運動中人員的參與。更重要的是由於學生在心理、人格上的特質（註二），使得學生的參與成了社會運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多數學生是在高二、三之後才開始參與社會運動——這已是學術研究的共識，而學生運動員的參與廣度、深度和她（他）們對動員過程的影響有時候會有決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這些年齡裏的學生（高中到大學）自身也在人格形成有劇烈變化的時期，因此政治社會學中就有（至少）兩個領域研究學生運動，伴隨著其他學科（諸如心理學、社會學）對這個現象的重視，可見學生的社會重要性。

本文主要在於探討學生運動和社會改革之間的關係。我們首先要從社運意義的介紹入手（註三），接著陳述學運與社運之間的關係，再來就是對我國從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的學運成果作一評估。除了強調學生運動對社會的正向影響之外，結論也會試圖對先前諸節之觀點作一整合。

社會運動的意義

社會運動理論在大體上提供了我們一個檢視現象的參考架構，其主要目的並不在於介紹一個「真理」。在這一節裏我們要介紹五個不同強調重點的社會運動研究法，雖然我們主要描述的，是美國的現象，但其中的許多道理是可以相當地適用在一般社會運動的探討中。這五種「理論」分別從人口的、心理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層面來看社會運動。

人口論

雖然社會運動可以說是和人類社會一樣地的歷史悠久，但學者對於社會運動的學術性興趣大體上肇始於一九六〇年代。有趣的是這個所謂「震盪的十年」（turbulent decade）事實上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不僅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西歐、北美（如法國、美國），努力試圖進入「第一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南韓、日本）；抑或是處於世界體系邊緣的緬甸、波蘭等亞歐（和若干非洲國家）第三世界都有著蓬勃的學運風潮。在這種情況之下第一個興趣的運動理論自然而然地就專注在人口結構的變化上。

這派理論重點在於視二次大戰以後的「嬰兒潮」是造成世界性運動風潮的起因。更進一步來說，在一九四五年出生的嬰兒（即：嬰兒潮的開始，也是二戰結束的一年）在一九六三年變成了大學入學年齡的十八歲，由於青年和兒童的大量增加以致於使她（他）們的父母親無法全心照顧。再加上各級老師的缺乏（相對於學生的增加）造成了「嬰兒潮世代」的「不足社會化」（Insufficient Socialization）。這個主因加上了越戰的昇高，極端景氣的美國經濟和快速的社會變遷使得一九六〇成爲了一個「爆炸的年代」（註四）。

心理論

與人口理論同時出現的有前面所提到的「代衝突理論」（見註二）和「集體行為」理論學，任何理論乃是一個淵遠流長的典範（註五）。如同代衝突一般，集體行為強調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心理狀態，也就因此凸顯了社運情境的「非常態」性。具體言之，集體行為的主要特徵有：第一、是集體行為的學者，普遍地認為「社會運動」是人們對於「不尋常情境」所做的反應，因此社會運動多是自發的無結構與組織的、感性的、無計畫的，甚至是混亂（失序）的。而基於此一特點所作出行為，多半是藉口傳粗糙的溝通模式所形成的。譬如情緒傳染、謠言、或摹仿等。集體行為理論者的第二個特徵是——儘管社會運動存

在於區間極大的光譜之上；也就是從極端雜亂無章到非常類似日常生活行為上——他們認為所有的集體行為是可以和日常生活的「常規」(routine)行為作一個對照。

整體而言，集體行為論者所看到的社會運動是一群在心理上有不滿或怨懣(Grievances)的人，針對情境中的偶發事件所做的自然反應，而這些針對特殊事件來發洩不滿情緒的群眾行為，通常對整個社會結構沒有持久的影響力，她(他)們的戲劇式行動(如抗議、遊行、示威等等)也會隨著事件的消失而落幕。

晚期的集體行為理論家，諸如透納和克連開始考慮上述兩個特徵的正確性(一九五七：一六一—一九)。他們甚至懷疑社運參與者是否針對心理的緊張和挫折來從事群眾行為。這些檢討，形成了日後的修正集體行為理論和古典的資源動員理論。

政治論(主要是古典的資源動員理論)

用政治論的眼光來看社會運動的方式，主要有兩種：戰爭論和古典資源動員理論。以前者而言，六十年代的越戰和九十年代的美伊之戰，都被視為是美國人民反對美國政府外交政策所展現的集體行動。這些反對的行為，是基於美國政府的國內政策造成了許多受迫害的弱勢群體(如黑人、原住民、婦女等等)，而這種內政的延申，就造成了霸權式的外交——對有色人種的侵略(註六)。換句話說，是不正義和不公平的政策提供了群眾動員的基礎，從表面看來，這種說法從來被學術界所普遍接受，但從尼克森的「沉默多數」(Silent majority)和九十年代保守派所倡言的「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議題來看，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在民間社會非常強而有力的。

古典的資源動員理論，大體上是由 Oberschall, Tilly, 和 Gansson (1973, 1975-1979) 等所提出來的，這一種取向的論述，基本上視運動為利用擾亂秩序的手段來爭取正義的過程。也就是說動員是用「非常」手段以求「正常」，政治延續的過程。因此它不必是非理性的或不連續的(失序的)，除此之外，古典的資源動員把重點放在從事運動的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SMO)，以及它們與政治資源的關係上。這就我們可以清晰

看出這與古典集體行為看法的不同在於：把重點由心理狀態轉移到組織特性，以及由微觀的個人到鉅觀的群體。質言之，這派理論的要素除了心理的積怨之外還加上了意識形態、組織模式、以及政治權力。

經濟論(主要是修正的資源動員理論)

針對政治論所做的改變，主要形成了七十年代末期蓬勃發展的「資源動員假說」。這種看法的最大特色在於把社運組織(SMOs)當成了最重要的分析單位。麥卡錫和查奧德(McCarthy and Zald, 1973, 1977)採用成本——效益分析法，並引用了大量的經濟學概念，像是需求曲線，廠牌忠誠與替代消費等等，來檢視不同社運組織之間的關係。此派之觀念，後來甚至發展成「運動工業」(Movement industry)的說法。

雖然這種論述取向發展出了許多深具意涵的社會運動討論，譬如 Freeman 在研究女權運動時的資源流通現象(註七)。而麥查二氏也強調了資源的重要性：在他們的討論中，心理上的不滿甚至可以利用資源產生，因此達到動員的目的(註八)。

整體而言，用新資源動員理論來看社會運動，是一個明顯的經濟模型。重點在於有資源方有運動，但此派學者對於資源的特質以及分類並無一致定論；而這種看法的最大貢獻，則在於對於動員過程中不同社會運動組織以及它們和資源之間的關係作了深入的探討。

文化變遷探討

經過以上的敘述後，我們可以發現在研究社會運動的領域中每一種的研究取向都有其優缺點。集體行為強調動員中的心理不滿因素，但對於實際的運動過程卻沒有深入的探討。代衝突則把不同年齡組的認知差異看成是促發運動主因，但如果年輕的一代是普遍地反抗主張者，為什麼前者有不同的反抗方式，並且參與的人亦有不同。

在古典資源動員論上，集體行為取向的缺失被彌補了，但對於社運組織的著重使得這種研究的方法有強烈的一元論痕跡，此外這派理論，也表現了靜態探討的缺失，對於突發事件，和隨情勢而改變的運動策略，組織型態是缺乏討

論的。

七十年代末期所發展出來的修正資源動員理論，是當時社運研究法的「顯學」。此種研究法的確對運動過程——尤其是對資源的使用上，有深入的探討。但它的缺點卻在於比古典學派還要強調組織，並且有強烈「經濟決定論」的味道。

自八十年代以降，社會運動理論逐漸發展到對各種典範整合的嚐試上。在一系列黑人人權運動的探討上，麥克亞當 (McAdam, 1982, 1988) 提出「政治過程模式」，摩瑞思 (Morris, 1984) 在研究黑人的民權運動中替他的研究法取名「本土化運動」(indigenous movement)，斯諾 (Snow, et al.) 等人提倡所謂「架構轉換」(frame alignment) 模型，而從法國發起的後現代化理論中，也視社運為一種社會變遷的現象展現。

在筆者所做的一個歷時四年的研究中 (Wang, 1992)，將這些嘗試明白的標示為「文化分析」法。此研究法的特色，在於它集合了許多其他理論的要素且用一整體 (holistic) 的觀點來看運動。當然文化分析也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運動理論，但與八十年代之前的理論相比它有若干的進步。質證「文化分析」試圖由機構變遷和個人意識的改變來檢視運動所經歷的過程和造成的結果。(Wang, 1992:14-6)

學運與社運

學運與社運之間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以六十年代的美國為例，流行於當時的三大運動之中，只有大學改革是全然與學生有關的。但即使黑人民權和反(越)戰運動也吸引了不計其數的高中、大學生參與，結果民權運動使得黑人正式去除了二等公民的地位和得到憲法所保障的人權。反戰運動不僅使詹森不敢競選連任，迫使尼克森不得不停止對越南和高棉的侵略，更引發了水門事件，使得尼克森黯然下野。其實除了政治上的效果之外，六〇年代美國學運的最大成就在於徹底改變了美國人的意識，並催化了婦女、原住民、環保、同性戀權益等其他社會運動的興起。

即使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之間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但學運依舊有著它自己

的特色，學生動員的特色有：

第一：學生運動不是階級運動。顯而易見的，學生作為一個社會類屬是相當接近韋伯身份群體 (Status group) 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意識，如果用馬克思的理論架構來看當更清楚：學生既非「有」the haves，亦非「沒有」the have-nots 階級，事實上，學生是一群「消費者」——她(他)們與生產是無關的。因此任何運用階級關係或國家、社會對立來分析的企圖都不適切。除此之外，學生也不像教課或做研究的學者所使用的二元的架構。把學生視為是一個針對社會不公平 (Social injustice)，而動員的弱勢群體是比較恰當的作法 (註九)。

第二：明顯的學生運動具有週期 (cycle) 的性質。這是因為學運的活躍分子一直都佔著極小的比例 (幾乎都小於學生人口的百分之一)，再加上學生是學校裏的過客——每隔三年或四年就會離開學校的情境，因此學生社團和動員經常會面對連續性的挑戰。在我的研究裏就以漲潮—退潮 (Boom-Bust) 來形容這種現象 (Wang, 1992 Chap. 7)，不論興衰都會有跨校際的影響，因為學生傾向於聯合行動。這在我們的學運裏尤其明顯。

第三：學生運動具有明顯的多重議題 multi-issue 性質，在各種運動裏我們都可以發現學生會員的踪跡。而在校園內的學生社團也有許多是標榜很籠統的概念 (如本土文化研究、政治討論、女權主義等) 但在不同的動員情境中會參與的現象。因此同一社團可能奔波於政治改革，原住民權益，婦女解放……各種運動之間。這種特質使得學生對校外的運動工業有強大的吸引力，但由於社會中一般運動團體在資源上的競爭，使得學運團體在訴求的爭取上顯得比較沒有力量。當然，多重議題的社運組織本來就比單一組織沒有效果，也是我們所必需注意的。

第四：基於第二和第三點的因素使得學生運動對於偶發事件特別敏感，許多被報導的學生動員就是 (episode)。因為學生針對一個特殊的事件組織活動而產生的 (五、四、保釣、天安門都如此)。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媒體和學運的關係。對媒體而言「事件」(events) 是具體、明確、戲劇性和有新聞價值的 (如罷課)，但「議題」(issues) (如大學改革) 通常是模糊，

不易報導、抽象和不具新聞價值的 (Epstein, 1973; Kahn and Goldenberg, 1991:105-7 等人有類似見解)。因此，學運團體必須常在事件和議題之間作一選擇，而「用媒體但不為媒體所用」亦成了一個困難的問題。

第五：學運造成個人價值觀的強烈衝擊。對學生動員的參與顯然較之於其他參與更有強烈的價值衝突。在筆者幾個學運相關的研究裏，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在課堂上告訴我們要誠實、有主見，敢『千萬人、吾往矣！』但在我們實際參與改變現狀的活動裏，我們卻被權威者說『你們還小，不懂事！』」別胡鬧，把書唸好是最重要的」等等，這些長者，讓我們對教育失望，也使我們質疑我們在課堂上所學習的！」由於校內環境比社會單純，而學生也的確比較理想主義取向，因此參與學運會對個人的道德觀產生強烈衝擊。

我國的學生運動

嚴格說起來從大陸淪陷到一九八〇年代的初期，在臺灣所發生的進步、民主的學生運動只有保衛釣魚台運動。由於政治上的一黨專政，以及校園裏所實行的黨化教育使得激進式的學生動員極為困難（林玉體，民七十九年：一七六一九），又由於國民黨認為大陸挫敗的原因是出自五、四之後的洶湧學潮，因此運用戒嚴法令禁止教師和學生的動員。而保釣這個揭發民族主義的反強權的學生運動，也在數日之內煙消雲散。

即使如此，自由、民主的校園意識，一直是不絕如縷地存在著的，而各種政治及社會動員也為八十年代的學運埋下了種子。這些解嚴前的事件包括了殷海光在六十年代所提出的反攻無望論、雷震案、彭明敏事件、大學雜誌的發行，以及中壢和美麗島事件。活躍的學生運動動員吳介民把八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分成三個時期：①醞釀期（一九八〇—一九八六），②突破期（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和嘗試串連期（一九八七—一九八八）。而各期有不同的活動方式、訴求重點及結果（張茂桂，一九八九：七七一八〇）。

事實上，臺灣的學生動員與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是息息相關的，在反對黨成立、戒嚴法取銷、報禁解除這一連串發生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的事件出現之後，幾乎所有的臺灣居民都參與了「新興的運動風潮」。而學生對校園民主

化、自由化的要求亦獲致了一些相當具體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自由之愛大學改革聯盟（自由之愛）、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大革會）、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由大革會演變形成）、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學聯）的先後產生，替臺灣在八十年代的末期寫下了熱鬧的學運史。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震驚了全世界，而共黨國家的相繼瓦解，也說明了世界正逐漸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時代。不可否認的，中國大陸的學潮對於六、四之後的世界局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誠如德國的統一、蘇維埃的解體和南斯拉夫、波蘭等東、南歐共黨國家的相繼崩潰等等。

而在臺灣繼六、四之後的學生運動也包括了同年的九、二八大學法修改動員和次年的三、一六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事件（又稱野百合事件），這兩者尤其是以後者深具重大意義，嚴格說來是第二次純粹以學生為參與主體的學生運動，而其所提出的四大要求（解散國大、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也部分地得到了執政黨的反應（註十）。

結 論

綜合了以上各部分的探討，我們可以體認學生運動的重要性。不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國家中，學生都是一股改革社會的勢力，不論在美國的反越戰、替黑人爭取民權，在日本的反安保、菲律賓的反駐軍、法國的反腐化保守主義等運動，全世界的學生從六十年代到現在一直都努力地在為更多的民主、人權、自由、和正義努力。

與其他各國相比，我國的學生在六十年代是沉寂的，但是在八十年代開始，我們的學生也普遍地投入了社會改革的動員行列中。不可否認地，學生運動是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和反權威的色彩，也有本文第三節所提到的特色，但就整體而言，學生的為改革所試圖從事動員，都對社會（在長期而言）有正向的影響。

在我國從八十年代中期所發生的運動風潮，不論在那一個項目上都有學生的參與，環保、女權、政治改革、原住民……在許多社會動員的景象中，我們都發現有學生會員的踪跡，因此對於一個更公理、人道和民主社會的追求，學

生是有著她(他)們的貢獻，而在社會運動的研究範疇中，也成了我們必須注意的課題。

註釋：

1. 在許多國內學者對於社會運動的探討中，下定義幾乎成了一個非做不可的儀式化行為，筆者亦不能免俗。
2. 在研究美國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文獻中有一個理論派別專門強調代間衝突。艾森斯達(一九五六、一九六九、一九七一)和費爾爾(一九六九)所持之論點，基本上視學生運動是非理性、激情、天真和理想主義的。代衝突把學生的政治動員看成是年輕人對抗老年人，孩子反對父母的一個產物，因為如此，所以學生運動並沒有正當的理由、理性的判斷，合法性和政治責任。根據費爾爾在《世代衝突：學生運動的特徵和重要性》中的陳述所有學運的特質都有恐怖主義、暴力、自救的傾向、對父親以及權威的拒斥、浪漫主義、精英主義、以及不容異端(一九六九：六八—七九)。在這裏我並不完全同意這一種說法，但站在社會心理的立場上，青年人(相對於老年人)是比較理想主義、浪漫及以唯美的。因此年青的學生比任何其他年齡組群容易因社會不平而動員。
3. 本文之所以選擇意義(而非定義)的闡述，主要乃因為在許多關於運動的論述中，學者對於各種定義都有詳細的介紹，請參閱張曉春，一九八六：九三—九四；孫清山，一九八八：九一—九六；張茂桂，一九九〇：一四—一九。
4. 在一九七四年由一群社會科學家所完成的一個研究中，人口組成的變化很明顯的被用來作為這派理論的支持點，見Coleman, J. et al. eds. "Youth;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尤其是 Ryder 的報告。pp. 45-64.
5. 從早期的芝加哥學派大師，像是 Park and Burgess (1921: 865-952); Blumer (1946: 165-220) 獨立的 Turner and Killian (1957); Lang and Lang (1961); 到功能學派的大將 Smelser (1962)，集體行為的典範是美國一九七〇年代之前解釋社會運動的主要理論。除了社會學以外，另外也有經濟學者以此理論來探討集體行為，見 Olson (1965)。

6. 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話：「越戰就是一群從紅人手中搶到土地的專制白人，利用黑人去屠殺黃人的勾當！」

7. Freeman 的研究顯示運動風潮的興起並不是許多的弱勢團體同時發現了對現狀的不滿而是一個運動團體的資源可以被其他的社運組織來利用，在這種情況之下，鼓勵了其他議題結合的興起。

8. 兩氏認為如有社會精英份子呼喚大眾注意「生活方式的危機」並且有資源配合(如社運組織的存在和極高明的演說家)則可以藉由資源的利用使人們產生心理上的不滿。

9.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階級分析或著關於政治體(state)的討論是不必要的。正相反，階級鬥爭或政治體系中的菁英都試圖拉攏學生而其目標和使用的策略手段與學生動員有密切的互動關係。重點在於本質上學生運動並不具有階級運動的意含。

10. 執政黨並沒有解散國民代表大會，也沒有針對學生要求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但國是會議在當年暑假召開而臨時條款也在次年被廢除。這些情形在學運剛結束時並未發生，因此有些人認為這是一次失敗的學生動員(因為學生被收買了)。

參考書目：

- 林玉體，民國七十九年「黨化教育與校園運動」在徐正光、朱文里合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圖書公司，頁一七五—一八八。
- 孫清山，一九八八，「從資源動員觀點論社會運動」，社會福利，六一：九—一六。
- 張曉春，一九八六，「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中國論壇二六五：九三—九四。
- 張茂桂，一九八九，「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 Blumer, H. 1946, Collective Behavior, in A. M. Lee ed. A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pp. 165-220.
- Ebstein, E. J. 1973, "News from Nowhere," N. Y.: Vintage Books.

- Eisenstadt, S. N. 1956,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Age Groups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 , 1969, "Changing Patterns of Youth Protest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ies," *Youth and Society*, September: 133-50.
- , 1971, "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llectual Antinomialism," *The annals*, 395: 68-79.
- Feuer, L. S. 1969,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s: 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amson, W. A. 1975,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 Dorsey.
- Kahn, K. F. and E. N. Goldenberg 1991, *The Media: Obstacle or Ally of Feminists?* *The Annals*, 515 (May): 105-7.
- Lang, K. and G. Lang, 1961, "Collective Dynamics," New York: Cronwell.
- McAdam, D.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50-197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8,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 and M. N.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 ,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41.
- Morris, A. D.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e for Chang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Oberschall, A.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 1979, "Protracted Conflict," in M. N. Zald, and J. D. McCarthy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 Winthrop Publication Inc.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k, R. E., E.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865-952.
- Ryder, N. B. 1974, in "Youth: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by J. Coleman et. al. e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5-64.
- Smelser, N. J.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now, D. A. et. al.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 464-81.
- Tilly, C. 1973, "Does Mobilization Bree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 (April): 425.
- Turner, T. and L. Killian, 1967,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Wang, Y. K. 1992, "Rebel with A Cause: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in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本文作者·王雅各現任中興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